



## 贫乏时代的愤怒

正如同许多人对中国摇滚的认识一直停留在“崔健时代”一样，许多人对崔健的认识也一直停留在《一无所有》时代，正因为《一无所有》的石破天惊，让世人认识了崔健，也认识了中国摇滚乐。据称在当时的百名歌星纪念国际和平音乐会上，在众多流行歌手纷纷演唱之后，崔健穿了一件颇像清代长褂的衣服，身背一把破吉他，两个裤脚一高一低地蹦上北京工人体育馆的舞台，台下观众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当音乐响起，他用破锣嗓子唱出“我曾经问个不休……”台下顿时变得静悄悄的。歌曲结束，在观众回过神来后的欢呼和掌声中，中国第一位摇滚歌星诞生了。

《一无所有》在当时不啻为一声惊雷，诞生出“我”的概念并立即开始在当时的青年心中激荡，因为在长久的革命歌曲和“红色经典”中，“我”的个人主体是被忽视的，“我”只是一个集体性的归属，而正是《一无所有》中的“问个不休”的“我”才宣告了个体独立意识的觉醒，从而让一种淳朴自然的个人表达找到突破口。自此，崔健个人也开始了他的摇滚的“新

长征之路”，同时也成为中国摇滚事业的一剂催化剂，在他的引导下，相当一批正处于青春困惑期，对社会持有批判眼光的青年人也投身摇滚，开始尝试着用摇滚特有的节奏与主张阐述自己的爱情与社会理想。

崔健的另一个社会意义也在于他的“红色情结”，这不仅仅在于他在演出中喜欢穿旧军装，直到现在戴的帽子上也有一颗红星，从1991年《解决》唱片中的《一块红布》到《红旗下的蛋》再到2005年《给你一点颜色》中的《红先生》，崔健一直像一个精神遗民，就连王朔都曾表示说崔健在《一块红布》用一首歌写出了一本书才能表达的内容，表达了整整一代60年代生人的精神追求和幻灭的历程。而与同时代的王朔等人习惯调侃和反讽不同，崔健一直严肃并且执着地坚持着自己自由自信自然的个人信条和政治情愫；与同一辈的孙国庆、臧天朔等人逐渐转向流行音乐和娱乐产业相比，崔健一直奉行着自己的音乐本位和社会批判；再与唐朝、黑豹等同时期的摇滚乐队相比，崔健作为“当今中国最为敏感的

一根神经”（乐评人李皖语）一直沿着自己在摇滚乐领域的进步和健康形象。

因为崔健的存在，中国摇滚乐在流行文化和青少年亚文化中的影响才得以进一步延伸到思想文化领域，包括他创作的歌词《一块红布》和《这儿的天空》被北京大学教授谢冕收入《二十世纪文学经典》，而他和“第六代”导演张元合作的《北京杂种》也成为中国新生代实验电影的代表作。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崔健多次代表中国到伦敦、柏林、东京等外国城市演出，而因为与国外流行音乐的交流日益增多，崔健从1998年的《无能的力量》开始，出于对黑人音乐和电子乐的衷爱而逐渐脱离中国歌迷的音乐欣赏口味，但他在2002年发起的“真唱运动”还是对流行音乐起到了净化作用。只是到新世纪的崔健越来越钟情节奏，在身体和灵魂的沉重中无法再激起大众狂欢，“崔健”的现实意义更多成为一种怀旧和集体回忆，但他本身既是一个时代的破坏者同时更是新时代的建设者，并且他一直是这个贫乏时代的歌者。

### 试说新语

## 从红旗下的蛋到网络下的蛋

中国摇滚乐的历史即使从1986年算起也已经有22年的历史，本应正是青春年华，但现状却是像其“教父”一样人到中年。在泛娱乐和体制的挤压下却显得步履蹒跚。“崔健”们代表的是上世纪50、60年代生人在经历80、90年代社会思想文化突变从精神苦闷到寻求释放的心灵历程；而伴随着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70后、80后甚至90后的时代心声，中国摇滚乐却集体失语。

“崔健”几乎成为了“中国摇滚”的同义词也证明了中国摇滚乐的畸形发展，随着时代的进步和人性在困局中的逐步的释放，商业化的所向披靡为当下青少年表达心志以及寻求个人解放提供了大量可能，网络时代的来临也让流行音乐的选择告别匮乏和单一，同时“崔健”们作为“红旗下的蛋”已成为了改革开放和中国摇滚的既得利益者，摇滚乐所代表

的“悲剧时代”的愤怒批判精神和自省意识正在一种喜剧时代“全民娱乐”的空间中失去位置。中国摇滚乐自身发展正在分化为一种背离流行音乐领域的小范围的自娱自乐，不放低身位一味追求虚无理想的困兽犹斗，再难出现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和《一块红布》这样可以作为社会发展晴雨表和时代记忆的歌曲。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延展，国际间流行音乐交流的进一步扩大和科技的日新月异，流行音乐受众的音乐消费观念也在相应转变，同时新世纪的青年人对摇滚乐的“苦大仇深和虚幻理想”不再感冒，乐迷更倾向于“轻松有趣和个人情绪”，摇滚乐不再成为拷问时代的利器或者集体愤怒的载体，而作为个人情趣的润滑，“红旗下的蛋”已与时代脱节，于是只能寄望于“网络下的蛋”去发出自己的声音。



张楚曾唱出90年代的社会心声。



谢天笑一度被誉为摇滚新教父。

“如果说西方摇滚乐是洪水猛兽，那么中国摇滚乐就像一把刀子。”

崔健在一次采访中说出这样的判断，比照而言，中国摇滚乐是舶来品，是真正伴随改革开放引进来的新鲜事物。也有人认为，中国摇滚和中国足球一样，搞不好是因为这些东西不适合中国人的身体品性。从崔健的判断中可以看出一种无奈，尤其是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和国际文化交流的扩展，中国摇滚乐能够拥有中国特色甚至站上世界舞台的可能性还是很小，而在现实意义上，这把刀子还必须去刻画出“脆弱或是坚强的美”。

### 那时正流行

#### 校园民谣



华语民谣在上世纪70年代率先在台湾地区兴起，台北中山堂的“现代民谣创作演唱会”上，大学生杨弦率先把诗人余光中的诗谱成曲子演唱，随后李双泽等人倡导“唱自己的歌”，并创作出《少年中国》、《龙的传人》、《乡间小路》、《外婆的澎湖湾》、《橄榄树》、《兰花草》、《蜗牛与黄鹂鸟》等焕发着青春和校园气息的现代民歌。刘文正、叶佳修等歌手直接催生了上世纪90年代《同桌的你》等大陆校园民谣。

#### 罗大佑



作为另一个具有流行音乐以及流行文化的“教父”，罗大佑因为其批判现实和人文关怀的精神，音乐同样经受了时间的检验。《童年》、《鹿港小镇》和《光阴的故事》等歌曲成为上世纪80年代的生存日记，而与他相近和相关的台湾歌手，还包括李宗盛、黄舒骏、齐秦、齐豫、苏芮等，都深刻影响了后世流行音乐的走向。

#### 西北风

上世纪80年代中国通俗音乐的一个辉煌记录，是大陆原创歌曲前所未有的发展高峰，作品风格多以西北地区传统文化为根基，歌唱黄土情，代表作品有《黄土高坡》、《我热恋的故乡》、《信天游》、《走西口》、《山沟沟》等，也让杭天琪、程琳、胡月、田震、那英、范琳琳等歌手一炮走红。

#### 囚歌

“西北风”过后，正在歌坛开始徘徊的时候，突然出现了一首《悔恨的泪》，“囚歌”一下子填补了空白，由张和平联合迟志强打造的“劳改歌”唱遍大街小巷。与此同时，一批知青歌曲也纷纷制作出版，《大冲击大流行》和《葡萄皮》广为传唱，《少年壮志不言愁》和《心中的太阳》则唱红了刘欢。